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者文选

# 胡乔木集

胡乔木集

胡乔木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胡乔木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乔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7-5004-2966-5

I. 胡… II. 中… III. 胡乔木-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2902 号

责任编辑 郑文林

责任校对 林福国

版式设计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mm 1/32

印 张 13.625

插 页 2

字 数 324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 编者的话

胡乔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是江苏盐城人，生于1912年6月1日。1930年夏，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毕业，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同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春，任清华大学团支部书记；秋，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32年秋，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秋，转学浙江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因领导学生运动于1935年初被迫离校。随即到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先后任社联党团成员、文总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临委委员。1937年5月，奉调赴陕北。先后任安吴战时青训班副主任、中央青委委员，主编《中国青年》。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在延安期间，协助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等历史文献，参与领导文艺界整风运动，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并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1945年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8月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参加党在重庆的文化宣传工作。年底返回延安。1947年4月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8年5月到西柏坡后，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并为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1975年复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协助邓小平进行整顿，后再遭打击。1977年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任院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五中全会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历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并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主任。1992年9月28日在北京病逝。他是中共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胡乔木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理论宣传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中都有高深的造诣和独创的见解。他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富有研究，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写过许多重要文章，对中共党史、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具有开创性的建树。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胡乔木是党性坚强、立场坚定的忠诚战士。

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他撰写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等著名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两个凡是”，他先后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等著名发言，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制造了舆论。在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的过程中，他主持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全面贯彻执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要求，先后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和起草小组内发表谈话三十多次，反复修改决议文稿，亲自撰写“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段落，为统一全党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批判的武器，发表了《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讲话，明确指出：“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任何领域的批评的共同基础。”“至于宣传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品，当然要进行批评，不管什么人反对，也要进行批评。”

胡乔木是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开拓者，党的文献工作的奠基人。

从1951年写成中共党史的奠基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到1991年发表总结七十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党史领域辛勤耕耘了四十年。他提出，党史研究和写作要有坚定的党性，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叙述党的历史”。同时，他又提出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指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是真理”，“历史要分析”，“要进行独立的科学的研究”，“要拿出权威性的材料，写得比较实在”，“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胡乔木关于党史研究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许多精辟见解，不仅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而且对所有的历史科学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从1941年参与编辑《六大以来》等“党书”，到中共十三大后领导修订《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胡乔木没有间断过党的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党的文献工作是在他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建国以后，他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文献工作在他主持下有了

大的突破。为《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集的编辑出版，他倾注了心血。在《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出版上，他花费精力最多，从文稿的选择和整理到注释的撰写，都经过他精心斟酌。经胡乔木审改的“党的文献编辑工作中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处理意见”得到中央批准，成为共同遵循的“法规”，而胡乔木在这方面的工作实绩，创造了供人仿效的范本，他的严谨学风和开拓创新精神，具有深远的启迪和教育作用。

胡乔木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他指导过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写了许多社论、评论和新闻。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以中宣部和新华社的名义就解决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出过一系列重要的指示。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领导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工作。强调人民日报“要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指出“报纸是党的工具，是帮助党推动工作前进的”，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改进报纸的工作一要联系实际，二要联系群众，三要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指导了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工作，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报纸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他认为要“扩大报道范围”，广泛反映国内国际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要“开展自由讨论”，加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的功能；主张报纸的副刊要办成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积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不断推进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又切实扭转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态。1982年春，有人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的说法，为新闻工作摆脱党的领导制造理论根据。对此，胡乔木阐明：“共产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共产党具

有这种先进性，所以它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指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

胡乔木又是中国文字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推进者。

他一直为完成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三项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规范化而不遗余力地奋斗。1982年，他在对汉字字形结构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简化汉字的十五条原则，为实现汉字信息化提供了基本思路。1984年，针对某些求成过急的主张，他再次指出：“汉字是消灭不了的”，“在很长的时期内汉字还要用，拼音化的过程会是很长的”；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内，仍然要坚持文字必须稳步进行改革的方针”。他认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研究整理现行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并使之完善化、规范化和加强文字改革的调查研究。这就把新时期的文字改革工作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上。

胡乔木始终关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他积极主张、大力宣传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他指出，用“两为”的新口号来代替“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有很大的必要。“两为”的口号“比‘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更本质”，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他透辟地说明，文学艺术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内容，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当然要提倡文艺作品表现某些强烈的政治主题。但是，这远不能代表文学艺术的全体。他指出，“某些没有倾向性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文

艺作品也仍然要存在和发展。只要是合乎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这就大大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赞扬优秀作家作品，批评错误创作倾向，是胡乔木指导文艺工作的主要方式。对片面宣扬现代派的思潮，胡乔木从中外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具有相当强的学术性。一方面，他肯定“艺术的创新是永远需要的”；无论中国和外国，不少追求现代派或采用现代派手法的作家还是反映现实，追求社会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他又指出，“艺术不能离开生活”，“创新离不开艺术最根本的原则”。现代派的情况相当复杂，它在20世纪不能成为主流。现实主义产生了许多文学人物、场景，提出了许多有社会意义的问题，道路很广阔。对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胡乔木也提出了科学的、合乎艺术规律的原则和方法。对中国诗歌形式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创造新格律诗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尝试，使他站到了这一领域的前沿。

与大多数学术大师的道路不同，作为革命者，胡乔木早在学生时代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他不是书斋里而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成为一个大学问家。他以学问家的姿态来指导思想理论战线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同时又从理论家的高度来指导做学问。这就决定了他的学术研究与大多数学术大师不同的特点，这就是学术研究同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紧密的结合。学术研究的成果，是他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或批评斗争的强有力的支柱。他的许多论文，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和严谨的学术性的统一。

程中原

2001年6月

# 目 录

编者前言	(1)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30)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55)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85)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89)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141)
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奋斗的旗帜	(206)
《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	(211)
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	(227)
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	(238)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	(246)
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57)

——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作

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	(283)
谈新闻工作的改革·····	(291)
祝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努力学习 列宁著作·····	(299)
汉字简化和改革的问题·····	(304)
关于现代汉语的规范问题·····	(316)
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讲话·····	(338)
诗歌的形式问题·····	(359)
如何把握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象·····	(378)
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纪念鲁迅·····	(386)
诗歌中的平仄问题·····	(394)
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	(396)
<b>作者主要著作目录·····</b>	<b>(408)</b>
<b>作者年表·····</b>	<b>(410)</b>

##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在1956年4月间，我们曾经就斯大林问题讨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那个时候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发生了一系列引起我国人民关切的事件。铁托同志在11月11日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对于这篇演说的评论，在我国报纸发表以后，再一次使人们提出了许多需要加以答复的问题。我们现在这篇文章将着重地讨论以下一些问题，就是：第一，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在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之间的对立。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痛苦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帝国主义从来就反对各国人民的解放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从来就把最坚决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作眼中钉。从第一

---

\* 此篇系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名义在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

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世以来，帝国主义就用尽一切手段来危害苏联。在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它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更成为世界政治中异常显著的现象。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美国，在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方面，作得特别凶恶无耻。它多年来阻挠着我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多年来公开地把颠覆东欧各国作为政府的政策。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正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所说，匈牙利事件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几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释都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些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匈牙利的反革命复辟阴谋被击退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操纵联合国通过反对苏联和干涉匈牙利内政的决议，一方面在整个西方世界煽起疯狂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美帝国主义尽管利用英法侵埃战争的失败，竭力企图夺取英法在中东北非的利益，但是还是声明保证同英法消除“误会”，取得“更密切、更亲密的谅解”，以便重整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亚非人民和反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统一战线，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义。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化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



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他尽可以污蔑我们一千次，诅咒我们一万次，这毫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他从“哲学”上要求帝国主义世界把对于共产主义的矛盾放在其他一切矛盾之上，一切都为了“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破坏”和“搞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这对于他们虽然肯定是徒劳的，对于我们却给了十分有益的教训。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